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3.003

“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价值意蕴与未来进路

卢迪,李芳云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00)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标志着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通过探究二者之间价值立场的高度契合、哲学意蕴的共通共融、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明晰了“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从为文化辟新、为道路筑基、为人类担当这三个层面回答了“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在未来的实践进路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明晰结合主体、激发文化活力、秉承开放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逻辑前提;价值意蕴;未来进路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3-0018-07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随后在各个重要会议、政府文件和公开讲话中对这一思想不断进行内容阐释与系统建构,特别是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作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的高度评价。“第二个结合”蕴含着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向,标志着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通过着重探讨“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价值意蕴与未来进路,旨在以“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扎实推进强国建设、凝聚民族复兴伟力注入精神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

“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前提在于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

性。”^[1]两者之间的结合绝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肤浅的表面式结合,只有彼此相互契合才能做到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高度的契合性,在哲学意蕴中的相容性和亲和性,以及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的实践探索为“结合”构筑了前提和基础。

1.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立场的高度契合

价值立场、价值追求蕴含在思想理论的深刻结构之中,在“幕后”主导着思想理论的创新不断发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2],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历史发展背后的物质动因提出了群众史观,认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为天下人民谋求幸福生活、让人民群众获得解放是其毕生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主体是人民,爱民恤民、政在养民、利民为民等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精华之一。可见,二者在历史主体和价值立场上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一致性。

一方面,二者都认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同唯心史观、英雄史观相对立,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类生产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指

收稿日期:2024-0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1YJA710015)

作者简介:卢迪(1996-),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芳云(1974-),女,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804767642@qq.com

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519},人民群众通过主体实践活动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历史,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同样,民本思想也深深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先秦时期,《尚书》提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礼记》写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揭示“人民”乃一国之根本。汉唐时期更是将人民与天地同等,唐太宗指出:“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晋书》)。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了华夏先民的重民思想,出身贫苦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明实录》谈到“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

另一方面,二者都注重为人民群众谋取自身利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人民性,改变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这一思想创立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2},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富民利民思想同样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富民利民思想的论述颇丰,《管子》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论语》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将富民利民思想不断沿袭发展,如东汉颁布的“假民公田”诏令,使流民拥有了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唐朝君主采取的一系列“以农为本、减轻徭役”的政策。

2.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意蕴的共通共融

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与扎根中华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发祥地与时代背景均有差异,但从哲学视角出发二者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特质与核心内涵具有诸多共通共融之处,这为“结合”的实现构建了前提和基础。

哲学世界观上,二者都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物质世界的消极理解,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的庇护所中彻底驱逐,认为物质是首要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5]47}其构成了一切,“意识一开始

就是社会的产物”^{[3]533}意识只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也就是物质的产物。中华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由具体物质组成,如:木、火、土、金、水五行生成万物的五行说;老子“道法自然”的自然论与庄子“通天下一气耳”的元气论;范缜《神灭论》提出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等,这些唯物主义思想打破了束缚在世人精神上的枷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哲学认识论上,二者都高度重视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头,最重要的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3},并且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生活就本质而言都是实践,强调一切社会意识“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501}。知与行的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论语》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荀子》“知之不若行之”。之后,知行观在宋明理学时期逐渐系统化,其中的典型代表如: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先知后行”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行而后知”观。

哲学方法论上,二者都主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断运动的,避免“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的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5]24},必须在全面、客观中看待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客观事物。同样,辩证思维也普遍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比如儒家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君子不器等思想观念;道家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音声相和等观点;阴阳家中的阴阳辩证关系,认为万物都是阴阳两极相互作用;佛教中的因果律、无常观、中道思维等思维方式。这些观点虽并不系统、科学,也无明确的辩证思维表述,但其核心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3.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二者“有机结合”的积极推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而是依旧彰显出其理论的科学性。这得益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思维纽带将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紧密连接

起来,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高度契合”到“有机结合”的转变。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不断对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进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一些“以儒代马”“文化复古”或者“全盘西化”“言必称希腊”等错误论调沉渣泛起。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6]⁷⁰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文化战线,在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正确取舍,将其中具有“阶级性”“腐朽性”的东西与“人民性”“进步性”的优秀文化区分开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为指导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7]³¹³,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体系对中华文明中的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加以“鉴别”,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能够与“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同时,采用“自觉扬弃”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不契合、不相融之处,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通过“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提供丰厚滋养,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结合”积极推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能够朝着科学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路人,在新征程上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二、“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余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上,“第二个结合”依旧历久弥新地散发着真理的光芒,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践行“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

1. 为文化辟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丰厚滋养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8]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来源,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思想理论犹如一潭死水失去生机活力,只有思想上主动求新、在行动上主动求变才能始终与时偕行、勇立潮头。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魂脉”,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文化根脉”,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壮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在民族国家时代脱离民族形式、民族色彩与民族底蕴而抽象发展”^[9]是断然不可能的,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完成对这一思想的“合中国化”“合时代化”改造,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哲学思维、处世原则等思想品格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推进“第二个结合”实践进程是实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之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审视”“过滤”和“扬弃”,并从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思想精髓、精神动力、价值引领,吸收具有生命力的鲜活因子、具有民族性的叙事手法、具有本土性的气派风貌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其以更“接”地气、更“重”实践、更“合”实际的话语体系与风格秉性找到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能够根植于华夏文明的“沃土”,因接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成为人民所接受、所认可、所喜爱、所运用的理论遵循,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后仍然能够具有“认识世界”的生命力、“指导实践”的行动力、“改变世界”的真理性的关键

所在。可见,“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广阔理论与实践创新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民族化中凝心聚力,在中国化、时代化中永葆生机。

2. 为道路筑基: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

筑牢中国道路的根基,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之源、形塑之根、成长之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行稳致远厚植了坚实的文化土壤。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与众不同?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夯实了理论基础、凝聚了群众共识,进而以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铸了传统文化根基。

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起点,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的特性,由这五个突出特性内在逻辑联系所构成的中华文化生命体,构成了中国道路存在的文化根基。“历史文化蕴藏着现实状况的密码”^[10],“第二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道路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特色”更具宏阔的历史纵深。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中国道路向前拓展的每一步都与“结合”密不可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养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天下同利”的国家观与国际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遵循;“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群众观巩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厚德载物”的人文关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内核;“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精神滋养

……这一系列日用而不自觉的优秀精神品格成为了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基因密码,为中国道路的向前发展提供深深的文化自信。可见,“第二个结合”在筑牢中国道路传统文化根基上具有突出价值,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 为人类担当:促进践行“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与世界情怀

进入21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但文明之间的隔阂、排外与冲突却在全球范围逐步抬头,各种强权政治、主义之争、排外情绪、和平赤字等论调使得人类社会发展充满不确定因素,“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是当前国际秩序遇到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1]³¹⁴“第二个结合”奉行中华文明中“胸怀天下”的长明之道,勇于破除西方的话语壁垒、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卡夫丁峡谷”,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就现实情况来看,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主导的“普世价值”,近乎以强制的手段命令世界各国接受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与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共识相异,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背道而驰。中华文明同属于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共生”文明理念,促使中华民族积极承担起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庄严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本国与世界的角度看待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问题,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基于“胸怀天下”的政治站位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共产主义文明指引下的“实然”图景。一方面,中华文明坚守“和平性”“包容性”的文明突出特性,奉行“以和为贵、睦邻友邦”的对外交往原则,坚持“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理念与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

于打造多极化世界格局,坚决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真正将“守望相助”“仁者爱人”“亲仁善邻”“与人为善”等文明互鉴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不求强,而求恒;不图霸,而图远”^[12],正是中华文明的深谋远虑之道,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边,推动世界文明的车轮朝着共生共荣的光明未来前行。

三、“第二个结合”的未来进路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8]“第二个结合”作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展开的必由之路,在未来的实践进路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持开阔的视野与开放的胸襟汲取世界文明成果,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质的飞跃。

1. 明晰结合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契合性,但契合不是无差别的统一,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无差别地进行全盘融合。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要使“第二个结合”始终朝向正确的、科学的方向不断发展,明晰结合的理论主体是二者相结合的首要原则。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3]53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8]对于“第二个结合”来说,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结合”实现互相成就这一根本任务目标。

毋庸置疑的是,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纵深、宏阔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历史内涵,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不能抽象地脱离当时社会现实背景,从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局限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在推进“第二个结

合”的进程中必须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的主导地位,廓清包括“主次颠倒论”“文化虚无论”“文化复古论”等在内的错误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筛选、扬弃、激活、转化。一方面,“结合”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中华文明宝库中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和思想精髓,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子”能够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对于合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消除阶级,倡导平等和共享,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中国古代的知行观进行深化,辩证法对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思维进行升华,不断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根本性指导地位,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指明方向、丰富内涵、赋能助力。

2. 激发文化活力: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

创新、创造是文化保持生命力的核心要义,无论何种文化如果仅仅固守原有的既定形式与内容内涵,不与现实相联系、相交往,其就无法摆脱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进而失去生命的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纵观古今五千年华夏文明中“经久不衰、富有永恒价值的精华部分”^[14],“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1]因此,必须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特点,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其适应、融合于现代社会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实践路径。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锁钥,是担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的应有之义。即要按照当下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

求,对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部分思想精髓赋予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例如:央视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影视化手段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互联网+博物馆”技术创新运用了数字化科技,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无缝”对接,通过指令让文物与观众互动提供了多元、新颖的参观体验。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激活其生命力,创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达方式来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到人们现代生活的审美活动和价值创造中来。又要立足当代的新发展新进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要义加以丰富、拓展、升华,使之更加贴合当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例如:将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宣传工作实践相融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语境解读;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服装服饰、建筑设计与各类文化活动之中,使得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这种方式更能同人民群众产生思想共鸣、形成利益交汇。总之,推进“第二个结合”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善于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不断更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3. 秉承开放包容:为“第二个结合”汲取人类文明精华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源泉。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世界文明百花园因多样的文化样态而繁荣兴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发展大势,具有不可逆、普遍性的特点,“开展中外文明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15]。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铸就离不开“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6]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立足国际视野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世界文化多元化建设、主动涵养世界范围内一切优秀文明形态,汇通中西之异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秉承对世界的开放交流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国际化进程,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外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的内在驱动,不仅能够促进世界文明的百花齐放,而且能够从优秀人类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通过理论的推陈出新提供“第二个结合”的源头活水,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永葆青春。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必须筑牢世界多样化的理念前提,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会通中西之异,在与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从而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空间。同时,在吸收借鉴其他人类文明形态时要始终坚守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牢牢立足于本国国情、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明晰二者的“主要地位”否则会陷入“外国的月亮更圆”的“主次颠倒”“主体模糊”的错误倾向中,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本土文化,避免一味地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模仿和追求,这是与其他人类文明开放包容的逻辑起点。唯有走入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够为文化创新提供新机遇、创造新可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屹立不倒,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竞争力,赓续中华文明的历史文脉、铸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新辉煌。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9] 郭红军, 童晗. “第二个结合”的三重向度[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1): 27-34.
- [10] 胡安全, 王峰. “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根基[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4, 16(1): 1-7, 95.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2] 董良峰, 闫培宇. “第二个结合”文明使命的三重价值意蕴[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2): 11-19.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刘伟杰, 戴祯.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发展路向[J/OL].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 [2024-04-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338.TS.20240222.1140.004.html>.
- [15] 吴桂韩. 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4): 1-9.
- [16] 习近平.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9-08-23(01).

The Logical Premise, Value Implication, and Future Path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LU Di, LI Fang-yun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n experience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PC 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which marks a new height in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far as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ncern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highly coincident values, the common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the CPC and clarifies the logical premis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t answer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n three aspects of creating a new culture,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road, and playing a role for human beings. To promot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n the way to practic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t clear the integrated subjects, inspire cultural vitality, and to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o achieve a new leap in the adap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logical premise; value implication; future approach

【编辑 吴晓利】